

增訂
文心雕龍
校注

黃叔琳注
李詳補注
楊明照校注拾遺

1206.2
265
:1

黃叔琳注
李詳補注
楊明照校注拾遺

增訂文心雕龍校注
上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增訂文心雕龍校注/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
-北京:中華書局,2000

ISBN 7-101-02205-7

I.增... II.①黃... ②李... ③楊... III.①文心雕龍-注
釋②文學理論-中國-南朝時代 IV.1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18776 號

責任編輯:孫通海

增訂文心雕龍校注

(全二冊)

黃叔琳注

李詳補注

楊明照校注拾遺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8¹/₈ 印張·7 插頁·661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78.00 元

ISBN 7-101-02205-7/I·315

明甘肅

大舜之甘也予永之聖德所折之亦已明矣且以此心
為表蓋予為甘解又述矣予之甘予友甘予甘也甘
人情性三之蔽不為予邪甘之為利信之晉看尔人
東七情者物所就之物為甘者自為甘焉予永之
予之曲美之事也門限不空任至竟以大之予之甘造
有民之甘樂方之甘建而己及大者九序惟予太
康敗世之子厥視順美迷而方不久矣自唐隆國雅
頌國備四水刻炳六宗深涼子及登絢素之字予子悟
琢唐之句友焉為二子之甘矣自王浮弥竭見人
微彩孝教親者視補舊之妙醉以霜實紫吟納而霜

元至正刊本

天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劉總撰

明欽汪一元刊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

天心雕龍卷第一

原道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

總撰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

明嘉靖汪一元刊本

明萬曆張之象刊本

文心雕龍卷之一

原道第一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

文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序和著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明萬曆胡維新刊兩京遺編本

明萬曆王惟儉刊訓故本（一）

文心雕龍訓故卷之一

明河南王惟儉訓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二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生而立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停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

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置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過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大文斯觀民胥以飭

校一字

易正義伏義氏有天下龍馬負圖以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

易傳爻詞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於於姜里係以象辭易道復顯

漢書孔子爲象象繫辭文言之類

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數自一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書皇國乃曆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明萬曆王惟儉刊訓故本（二）

前言

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批評專著，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整的，當推劉勰的《文心雕龍》了。可是關於作者的生平事迹，史書的記載却語焉不詳。爲了有助於讀者知人論世，姑作如下簡介：

劉勰，字彥和，大約出生於劉宋泰始二、三年（公元四六六——四六七年）間。祖籍原在東莞郡莒縣（今山東莒縣），永嘉之亂時，他的祖先南奔渡江，從此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京口本爲南朝重鎮，又是人文薈萃之區，先後在這裏講學的著名經學家、史學家有關康之、臧榮緒和諸葛璩等人〔一〕。流風遺韻，對劉勰可能有過某些影響。

宋齊禪代和統治集團內部的明爭暗鬭，使原來顯赫一時的劉穆之、劉秀之的子子孫孫，政治地位不斷下降；劉勰的一家，更是又遜一籌了。他的祖父劉靈真儘管是宋司空劉秀之的弟弟，却没有當上官，

父親劉尚也只任越騎校尉，這與史傳所說的「家貧」，是不無關係的。

早孤的劉勰，並不因為無人管教和家道中落而放鬆學習，却自覺地篤志好學。所讀的書，大概不外儒家典籍。他的儒家思想，也從此紮下了根。但在佛學甚囂塵上的當時，劉勰却曾受其影響而不婚娶。這是一時的風尚，不止劉勰一人為然。比他早的如周續之，同時代的如劉歊、劉訐，家境都很優裕，就是由於信佛才沒有結婚的（三）。而且周續之「通五經」、劉歊「六歲誦《論語》、《毛詩》」（三），還是儒家信徒哩。

另一種風尚是，從後漢末期牟子的《理惑論》出現以來，儒佛合爐共治的傾向已日益普遍。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除照例肄習儒家經典外，為了適應潮流，以利於向上爬，都愛到寺廟去跟和尚們打交道：有的是誡戒範（四），有的是聽內典（五），有的是攻尋文義（六），有的是瞻仰風德（七），有的則住在寺裏讀經論，明佛理（八）。寺廟廣開，投身接足者頗不乏人（九）。本已信佛而又篤志好學的劉勰，自然是聞其風而悅之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鍾山上定林寺（一〇）是名列前茅的。自劉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曇摩密多建寺（一一）以後，高僧輩出（一二），而又由於「士庶欽風，獻奉稠疊」（一三）和「獲信施」（一四），饒有貲財，富於藏書。「埒美嵩、華」的鍾山和「鬱爾層構」的「禪房殿宇」（一五），也是無車馬喧的讀書勝地。劉勰為了獲得一個比家裏條件更好的學習環境，專心致志地攻讀若干年，「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文心雕龍·程器》），上定林寺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地方，同時也是他希圖走入仕途的終南捷徑。

上定林寺的方丈釋僧祐，是當時「德熾釋門，名蓋淨衆」^{〔二〕}的大法師，白黑門徒多達一萬餘人^{〔三〕}。篤志好學的青年劉勰前去投依，是送上門的難得助手，僧祐當然是歡迎的。這樣，劉勰在與僧祐相處的十餘年中，除了刻苦閱讀釋典外，經史子集必然也在鑽研之列。因而「博通經論」，「深得文理」。不但編定了寺內所藏的經藏和撰述一些「會道控儒，承經作訓」^{〔四〕}的論文，而且還寫成了不朽的著作《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成書於齊和帝中興元、二年（公元五〇一——五〇二年）間^{〔五〕}，由於和當時瀰漫文壇的形式主義文風異趣，曲高和寡，不爲人們所重。劉勰堅信自己著作的價值，決定請一代文宗沈約品定。這時沈約官居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炙手可熱。社會地位低下的劉勰無從自達，只好裝成書賈的模樣，守候在路邊，等待沈約的車駕經過，便上前推銷頗爲自負的著作——《文心雕龍》。沈約讀後，大加贊賞，認爲「深得文理」，置於案頭，以便隨時觀覽。劉勰在《知音篇》裏曾慨嘆知音難逢，而這一別開生面的自薦，却逢其知音了。從這裏也就不難看出，劉勰從政之心何等強烈。否則書成之後，即使不爲人們所重，大可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又何必作貨鬻之狀，干沈約於車前呢！

多半由於沈約的薦引，劉勰在天監（梁武帝蕭衍受齊禪後年號）初起家奉朝請，從此踏上了仕途。他先後擔任和兼任過中軍臨川王蕭宏、南康王蕭績的記室，車騎倉曹參軍，太末（今浙江衢縣）令，步兵校尉，東宮通事舍人等職務。任太末令時，「政有清績」，可見他是具有「工文」「練治」的才能的，也是他「奉時聘績」的具體表現。在兼任東宮通事舍人期間，受到當時另一位文學家昭明太子蕭統的「愛接」，

他們共同討論論篇籍，商榷古今的情況，是不難想見的。蕭統選錄的著名文學總集《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選文定篇」（《序志》）多有契合之處，恐怕不是偶然的。

佞佛的梁武帝於天監十六年（公元五一七年）十月饗薦改用蔬果之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劉勰認為改革不夠徹底，便於次年八月後上表，建議二郊農社也應只用蔬果。這自然是他的佛教思想有所擡頭的反映，但也可能有希圖升遷，得以進一步發揮其才能的打算在內。到了中大通三年（公元五三一年）昭明太子一死，東宮舊人例不得留，劉勰既未新除其它官職，奉敕與沙門慧震於上定林寺撰經，大概就在這段時間吧。任務完成，他便請求出家，並先燬鬚髮以表示決心。被批准後，就在該寺當了和尚，法名慧地。無可奈何的歸宿，不到一年光景便去世了。這時大約是梁大同四年或五年（公元五三八年——五三九年）。劉勰一生歷宋、齊、梁三世，計得七十二三歲。在南朝文學家中，像他這樣的高齡，還不多見。

史傳說劉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制文」。可見他在當時是負有盛名的作家。惜其文集早已失傳。現在除了《文心雕龍》以外，只有《滅惑論》和《梁建安王造剎山石城寺石像碑》兩篇保存了下來。

劉勰在《序志篇》裏敘述寫作《文心雕龍》的動機，是由於夢見自己拿着丹漆禮器，追隨孔子南行，因而感到非常高興。本想「敷讀聖旨，莫若注經」，可是「馬（融）、鄭（玄）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好在「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詳其本源，莫非經典」。這纔搦筆和墨，選擇了論文之一途。

在劉勰看來，「論文」與「注經」都屬於「敷讚聖旨」，是殊途同歸的，跟馬、鄭諸儒一樣地足以「立家」。

這種古文經學派的立場，使劉勰不滿於當時的形式主義文學。據裴子野《雕蟲論》所述，宋齊以來的文學狀況是：「自是間閭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劉勰認爲這是文學背離了儒家原則的結果。他在《序志篇》裏說：「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聲貌，離本彌甚，將遂訛濫。」《通變篇》也說：「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文心雕龍》就是爲了矯正這種離經叛道的文風而寫作的。

由於劉勰以儒家思想爲出發點，所以他用《原道》、《徵聖》、《宗經》三篇來籠罩《文心雕龍》全書，確立了文學的基本原則：「道心」是文學的本原，「聖人」是立言的標準，經書是文章的典範。這種儒學的教條既有反對唯美主義文學的一面，又有着很大的局限和缺陷。不過，「論文」畢竟不等於「注經」，《文心雕龍》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内容，對大量的文學現象進行了具體而細緻的分析，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這是不能簡單地用儒家思想來包括的，《文心雕龍》的卓越貢獻也正在這裏。

當然，劉勰的思想是複雜的，有矛盾的。既業於儒，又染於佛，在他的頭腦裏，儒佛兩家思想都有。但二者之間既不能劃等號，也不能看成永遠是鐵板一塊，而是此起彼伏，互有消長的。當他在撰述《文心雕龍》之前寫《滅惑論》時^(二)，佛家思想居於主導地位，即是說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佛學的唯心主義思想，他必然站在佛家的立場上，對「謗佛」的《三破論》予以還擊，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當他夢見孔子後寫《文心雕龍》時，儒家思想居於主導地位，即是說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儒學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他又必然站在儒家的立場上，來「述先哲之誥」，持論謹嚴，自成一家。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時間既不相同，內容亦復各異，因而劉勰在《滅惑論》和《文心雕龍》中所表現的思想判若天淵，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裏還須指出，《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專著，所原的「道」，所徵的「聖」，所宗的「經」，皆中國所有；所闡述的文學創作理論，所評騭的作家、作品，亦為中國所有。與佛經著作或印度文學都無直接間接關係。所以全書中找不到一點佛家思想或佛學理論的痕迹，而是充滿了濃厚的儒學觀念。這固然可以看出劉勰著書態度的嚴肅，但更重要的則是由於《文心雕龍》本身的内容所決定。至於全書文理之密察，組織之謹嚴，似又與劉勰的「博通經論」有關。因為他那嚴密細緻的思想方法，無疑是受了佛經著作的影響的。

《文心雕龍》是劉勰慘淡經營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巋然屹立的高峰！

二

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從先秦以來文學理論批評的不斷發展而出現的一部傑作。全書由五十篇組成，分為上下兩編，約三萬七千餘字。上編論述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各種文體的源流演變，下編則為創作

論、批評論和統攝全書的序。結構嚴密，體大慮周，構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理論體系。列寧曾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三)我們按照列寧的教導來衡量劉勰，那他在《文心雕龍》中的確比他的前輩提供了不少新的東西，不愧是我國最優秀的古代文學理論遺產之一，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和探討。

在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上，劉勰認為文學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也浸透了作家的主觀感情。

《物色篇》說：「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明詩篇》也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學創作的對象是「物」，豐富多采的客觀事物引起了人們感情的波動，纔發而為文辭。這種物——情——文的公式，是符合唯物論的反映論的。劉勰要求這種反映盡可能地真實：「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這就是要求文學創作要宛轉入微地刻畫客觀事物的面貌，委曲細緻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說：「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把表達作者情志放在第一位，而把刻畫事物形貌放在第二位，因而不滿於「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物色》）的傾向。但這並不是反對文學創作不應該「形似」，而是反對片面追求「形似」的形式主義文風。

以上是就描寫自然景物而言。當然，文學創作最重要的對象還是描寫人們的社會生活。劉勰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時序》）；「是以師曠規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樂府》）。這就是說文學的發展變化是由社會情況、時代面貌決定的，因為文學就是社會和時代的反映。所以他分析

建安文學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序》）。這一段論述，是從建安文學和那個動亂時代的關係着眼，所以能精闢地總結出建安文學的特徵。劉勰的這些觀點，繼承了自《禮記·樂記》和《毛詩序》以來我國文論的優秀傳統。

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上，劉勰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要求文學為封建制度服務。

《徵聖篇》發揮了儒家論文的傳統主張，把文學的社會作用歸納為三點：「政化貴文」、「事蹟貴文」和「修身貴文」。他把文學的社會功能提到了極高的地位，《序志篇》對「文章之用」說是「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程器篇》也說：「摛文必在緯軍國。」這種對政事教化的強調，也貫穿在文體論各篇中，如《議對篇》要求對策能「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書記篇》指出「書記所總」的二十四種「藝文末品」，為「政事先務」。正因為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在所評論的作品中，除了一些應用文外，還有學術著作。這是由於他的廣義的文學觀念使然。比起蕭統「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文選序》）的選文標準，就顯得瞠乎其後了。

劉勰的這些觀點，表現了儒家思想封建保守的一面。不過，當時文壇上佔主流的形式主義文學，完全抹煞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墮入了為藝術而藝術的泥坑。劉勰反對「近代文人，務華棄實」（《程器》），也並非沒有積極的意義。

在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劉勰認為內容決定形式，形式表現內容，要求作品達到二者的統一。

《情采篇》說：「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這是比喻一定的形式（「文」）是由

一定的內容（質）所決定的；「虎豹無文，則鞶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這是以喻一定的內容要求一定的形式來表現。在文、質並重的前提下，他並不把二者同等看待：「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歸根到底，文章的美好（辯麗）不是取決於它的形式（文采），而是取決於它的內容（情性）。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他主張由「經正」導致「緯成」，由「理定」達到「辭暢」，要求內容和形式象經綫和緯綫一樣有機地組織成一個整體，這種辯證的觀點貫徹在《文心雕龍》全書中。

根據這個原則，劉勰對比了兩種不同的創作傾向：「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這雖然是總結歷史經驗，實際是針對當時文壇而發，因爲「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疎，逐文之篇愈盛」。因此，他着重批判了重形式、輕內容的傾向：「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這表明《文心雕龍》對當時的浮豔文風是一種挑戰。

在繼承與創新的問題上，劉勰主張既尊重歷史形成的文學規律，又根據現實的情況加以創新。

《通變篇》說：「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這是就繼承而言，各種文體有一定的寫作規格，需要通過借鑒前人的作品來掌握；「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這是就創新而言，臨文時的變化無窮，要依靠作者的獨創性來實現。只要正確處理「通」（繼承）和「變」（創新）的關係，「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在規律